

“问题研究”与“学科构建”

周立群

(南开大学)

(一)

“中国问题研究”(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历史、社会)是当今倍受关注议题之一,但“中国问题研究”与“中国学”却是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中国问题研究”是指对一个或几个重要问题多视角、多方法、多方位、多学科的研究,大家可比相互启发、相互比照,所作出的结论和价值判断不求一致,也难得一致。“多异少同”、“求异存同”是“中国问题研究”的特点。

“中国学”则属于一个有独立对象的学科,其要求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和共同的研究方法。构建“中国学”的难度在于如何作到方法的一致性和多学科的交叉性。

爱知大学加加美光行教授的《现代中国学的新范式——共同态度性的提倡》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层面作了有益的探讨,从历史回顾中反思了东西方价值观差异,读后很受启发。作者认为正是它造成了对当时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政策选择所面临的客观条件的主观认知出现彼此误解从而最终导致行为冲突的动力之源。

在我看来,提倡共同态度性是在人类认知领域中某种程度上的“相互理解和尊重”。提倡豁达的包容性和卓越的同化力可以说是就价值而言的“共识”,它使双方或多方彼此感受,彼此包容,彼此体谅。这可以说是构建“中国学”的前题。

但是,共同态度性的提倡愿望虽好,真正达成却有远远的路要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它的实现必须借助于经济的交往、文化的传承,教育的助力,价值观的引导以及对有关历史遗留问题的真实面对与积极解决。共同态度性的实现需要在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内生”获得。自发的“共识”需要在今后的历史选择中通过它实现彼此之间良性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才能形成共同运动的有机整体。

如果说这种“共识”孕育与获得的母体是“文化”。那么不论是亚洲还是世界,每个国家都不能说自己是全球世界性多元文化的主人,只能说是这个“生命共同体”中的一部分、一分子。比如,在对亚洲“共同态度性”的讨论不能离开东方世界的价值观念,而东方价值观念又离不开儒家伦理和思想,离不开孔子所提倡的一系列行为规范准则。西方学者马克斯·韦伯认为,儒教和清教都出发于理性,不过二者的差别在于:清教的核心在于运用理性去控制世界,而儒教则是崇尚适应世界。也正是因为后者所支撑的社会内部稳定的文化结构阻碍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发育和成长,阻碍了东方近代化的进程。

多元文化的主人的“共同态度性”培育不仅需要各自文化的科学反思,而且需要对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客观审视。文明的危机必然要求文明的重构,这一过程也是对本土文化价值的重新审视、判断、筛选、定向的动态过程。“共同态度性”只有在时间上与现代化相对接,在空间上与全球化相关联,才能焕发生生不息的活力和勃勃生机。

(二)

就经济研究和经济学的发展而言。近十年来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日益增多,在中国国

内,经济学的研究是跨越国界最重要的学科之一,或者说是国际化进程最快的学科之一。这一方面表现为研究方法的一致性,各国学者、各学术流派越来越多的运用共同的方法、数据和分析工具探索共同关心的问题,并形成了共同遵守的学术规范,尽管所作出的价值判断不同。另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和国家、民族间的经济交往使得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集中,各国学者、不同学术流派可以在同一平台上就同一问题进行深度切磋交流。

前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研究是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因为经济转型期复杂经济现象和经济事件需要作出理论的阐释,同时,转型过程也是一个发展道路和体制模式的选择过程,需要理论的支持。近年来,我们同美国、日本、俄罗斯、英国、加拿大、法国、捷克等国的学者专家就中国及其它转型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如转型过程中的市场结构、竞争与所有制、劳动力流动、人力资本、金融危机、外国投资、商业腐败、公司治理、货币政策、对外贸易、渐进与激进改革(Gradual or Radical Reform)等。

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不是个别国家或地区的事件,也不是暂时的现象,而是国际性的、全方位的,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在笔者看来,仅仅把转型视为体制转变(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不够的。因为无论是体制转变的条件和背景,还是体制转型的动因和取向,都与经济全球化密不可分,因此对转型的研究应包含经济转型和体制转型。体制转型不仅在不同国家和洲区发生和进行着,而且正在改变着整个世界的格局。这两个转型实际上隐含着二十一世纪经济发展、世界市场格局以及社会体制的许多重要而又丰富的内涵。

全球化趋势正在给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带来深刻影响。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技术突破,特别是信息技术的,把国家和地区间的联系、合作和竞争提升到一个新的平台,并提供了新的手段,地区跨度和障碍、全球经济合作的体制性障碍也将大大削弱。

就体制转型来说,它也不仅仅是一种管理方式替代另一种管理方式,一种调节机制替代另一种调节机制,它本身蕴含着深刻的制度变迁和社会变革,这种变革与经济发展模式相联系并与之相适应,进而它是一个生产力发展、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变革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系列变动。

迎接全球化挑战在体制转型的目标和路径方面不同国度所作出的选择是不同的。这取决于其各自的历史、资源条件、经济发展阶段及文化差异等。转型问题研究的文献中强调,转型过程中并非所有的国家都走同样的道路。由于它们的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和资源条件,因而各国在转型的出发点、战略及成果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没有独一无二的模式可以仿效,实际上市场经济的优势在于它在不同文化中的差异性及其适应性。

从近二十年的演变历程看,转型国家在经济转型和体制转型的路径选择上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差异决不仅仅是政府决策和政策选择,而就其更深层面看是各国历史、资源条件、经济发展阶段及文化等方面差异性在转型目标和路径选择方面的再现。因此,在不同国度的差异和多样性中驾驭经济转型和把握体制转型有助于深化对转型规律性的再认识。

转型国家在文化上的差异性、路径上的多维性和所面临路障的复杂性,为转型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比较、借鉴和总结概括的可能。经济学所研究的转型转型问题给予我们一个很好的实验场和平台,“共同态度性”或许会在这一领域获得更多的共识,方法的一致性和多学科交叉性或许找到更多的交融点。